

# 财政问题讲座

——全国第一期地、市级财政局长训练班教材

【内部试用】

上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编

一九八〇年六月

## 前 言

这本《财政问题讲座》是根据在1980年第一期全国各地（市）级财政局长训练班上所讲授的专题报告和专业基础课的内容整理汇编而成的。

训练班的学习目的和要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学习经济理论和财政专业知识为重点，要求通过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并进一步熟悉财政方针、政策和财政业务，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为此，在课程安排上，主要是讲授财政专题和专业基础理论，同时安排了政治经济学和企业管理专题讲座。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为专题讲座部分。其内容主要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阐明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专题分别由财政部副部长和各有关司、局、行、所、学院负责同志讲授。

参加专题讲座的领导同志有：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同志讲授《关于财政方面的若干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武博山同志讲授《基本建设和财政的关系》；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同志讲授《论财政分配结构与国民经济结构的关系》；预算司副司长金鑫同志讲授《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税务总局局长刘志诚同志讲授《关于工商税制改革问题》；工业交通商业财务司副司长柳标同志讲授《改革企业财务管理体制问题》；农业财务司副司长葛致

达同志讲授《对我国财政支援农业发展一些经验的认识》，文教行政财务司副司长林双木同志讲授《对作好文教行政财务工作的几点意见》，财政监察司司长杨汝楹同志讲授《如何做好财政监察工作》，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讲授《进一步贯彻会计人员职责条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姜明远同志讲授《中国“四化”和财政问题》，张焕彩同志讲授《财政和银行》，财政科学研究所陈宝森同志讲授《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的财政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中央财金学院曲兴业同志讲授《苏联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计划体系》。

下册为财政业务课程部分。共分为五篇。除第五篇第十二讲《国营农场财务管理问题》由农业财务司官成喜同志编讲外，其它各篇均为中央财金学院教师编讲。

第一篇《财政预算问题》由赵春新同志编讲；第二篇《国家税收》由胡中流同志编讲；第三篇《工业企业财务》由秦元英、景致同志编讲；第四篇《基本建设财务》由林犹恭同志编讲；第五篇《农业财务》第廿、廿一讲由康立人同志编讲。

本书可作为近期内地(市)级财政领导干部训练班试用教材，也可作为在职财政干部自学参考读物。由于参加编讲的同志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有限，时间比较仓促，其中缺点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 目 录

- 关于财政方面的若干问题……………王丙乾（1）
- 基本建设和财政的关系……………武博山（26）
- 论财政分配结构与国民经济结构的关系……………许毅（46）
- 财政管理体制问题……………金鑫（67）
- 关于工商税制改革问题……………刘志诚（114）
- 改革企业财务管理体制问题……………柳标（137）
- 对我国财政支援农业发展一些经验的认识……………葛致达（158）
- 对作好文教行政财务工作的几点意见……………林双木（188）
- 如何做好财政监察工作……………杨汝楹（209）
- 进一步贯彻会计人员职权条例……………杨纪琬（229）
- 中国“四化”和财政问题……………姜明远（241）
- 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的财政政策及其对我国的  
借鉴作用……………陈宝森（268）
- 苏联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计划体系……………曲兴业（317）

# 关于财政方面的若干问题

王 丙 乾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次地市财政局长训练班和中等财政专业学校领导干部训练班，要我来讲讲财政方面的问题，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但是由于近来工作比较忙，一直拖到现在。大家知道，在四化建设中，财政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通过资金的积累、分配和监督使用，来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方面工作搞得好不好，对全局关系很大。前些时候，我在高级党校讲过一次财政问题，今天的讲话就是在那次讲课的基础上，着重谈几个主要问题。讲得不对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下面，讲三个问题：

## 一、经济建设方针与财政的关系问题

我们大家都懂得，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因此，讲财政问题，就不能不联系经济问题，不能不联系建设方针问题。实践证明，搞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资金，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有更多的资金，而能不能积累更多的资金，不在于财政本身，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战略方针。三十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近百分之十，总的说，增长速度并不低，问题是年度之间波动幅度太大。例如，“一五”时期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是持续上升的；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来了一个折腾，结果是“二五”期间财政收入的平均年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零点二，想快反

而慢，甚至倒退到“饿肚子”、“闹浮肿”的地步，教训是很深刻的。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被迫采取调整措施，不少企业关停并转，基建压缩到五十五亿元，职工精减下放近二千万人，总算度过了困难，并使国民经济转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财政收入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七。但情况刚刚好了几年，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有错误，头脑又发热，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文化”，而是“武化”，到处是打、砸、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国民经济倒退到崩溃的边缘。这一次大破坏，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的损失之严重，都是建国以来空前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间，财政收入的平均年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三点三。

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不发生几次瞎折腾的情况，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二十年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速度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以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七以上（“一五”期间轻工业的比重较大，工农业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点九，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二点三），按这个速度与实际比较，二十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少实现一万四千亿元左右，财政收入少收三千亿元左右。如果加上支出方面的损失浪费、无效投资、平调退赔和处理遗留问题等，财政上总的损失估计有四千八百多亿元，相当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总数。这就是二十年间几次折腾付出的巨大代价，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后的今天，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仍有一大堆，拖着我們前进的后腿。

经济上的折腾，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动乱。但是，政治上有极左的干扰，经济上也必然有极左的干扰，两者互相影

响，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和分析。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来验查，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用政治代替经济，忽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也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长期以来把政治、阶级斗争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什么“抓了阶级斗争，生产就上去了”，“有了政治挂帅，一切就有了”，“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规章制度是“管、卡、压”等等，使人们忽视了对经济规律的探讨，忽视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忽视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加强，忽视了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这方面的影响，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除。

**（二）凭主观想象指导经济，不讲实事求是，急于求成，欲速不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强调要翻番，谁要说个“不”字，什么“促退派”、“保守派”、“秋后算账派”等政治帽子一齐压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也提出“鞍钢三年翻一番，大家怎么办？”于是都提大计划、说大话，一哄而起，事后又不了了之，即使造成经济损失，也不负什么经济责任。订计划的时候，口头上总是讲要“留有余地”，实际上年年有一大堆缺口。最突出的是基本建设，明明钢材、水泥、木材都有缺口，却偏偏要往上加。结果是物资紧张，基建挤生产，生产挤维修，工厂停停打打，机器带病运转。反映在财政上，就是四面叫紧，不得不留缺口、打赤字。这种做法，使基建战线越拉越长，摊子越铺越多，许多项目长期不能建成投产，占压着一大批资金，长期打消耗战，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影响了财政资金的积累速度。

再就是只讲主观需要，忽视客观可能，往往是闻风而动，一拥而上。例如，一说要搞三线建设，就是大小三线一

齐上，甚至强调内地有的，三线要有；内地没有的，三线也要有。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九年，大小三线投资达×千×百亿元，占同期基建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由于突击建设，缺乏全盘规划，不少厂子不配套、不衔接，或者技术不过关，任务吃不饱，花了那么多的钱，并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又如，一说要搞农机化，就不顾实际是否可能，一拥而上，齐头并进。全国拖拉机厂达到一百四十多个，而大小拖拉机产量却只有十几万台，手扶拖拉机二十来万台。再如，一说要逐步建设几个大区的工业体系，也是一哄而上，许多省都要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要搞工业省，甚至有的县也要“自成体系、县自为战”，搞工业县。类似这种一阵风的搞法，不仅助长了瞎指挥、浮夸风，而且严重地破坏比例关系，影响建设速度，今后再也不要搞了。

**三）忽视综合平衡，破坏了经济发展中应有的比例关系。**国民经济必须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过去的阶级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客观上也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但是他们不可能自觉地有计划地做到这一点。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点，决定我们能够通过计划来自觉地进行综合平衡，从而使国民经济保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可能并不等于“必然”，搞得不好，同样也会比例失调，受到惩罚。这方面，过去我们吃过不少苦头，也受到了它的惩罚。例如：

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上，建国初期搞得比较好，后来总结出了“二、三、四”的经验（即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财政收入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但不久就被扔到一边去了。以后许多年份积累所占的比例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最高的年份曾达到百分之四十三点八，以致破坏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比例关系，造成了大量欠账，不得不退下来；等到刚刚缓了一口气，积累所占的比例又被强行拉上去，最后又被迫退下来。这样，一进一退、一上一下，每次都造成经济生活中的混乱和经济上的大量损失。从历史经验来看，积累比例高的年份，经济发展并不快，而保持合理比例的时候，经济发展比较快。这说明在国民经济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农轻重的关系上，每一次总结经验、制定计划时，口头上总是强调农轻重的次序，但实际干起来却往往是重轻农。一九五八年以后，强调“以钢为纲”、“为钢让路”，只顾一头，不顾其他，结果挤了农业，挤了轻工业，文教科学更不用说了。六十年代又强调搞大小三线建设，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也是挤了农业、轻工业和科学文教，并且影响了一二线地区的建设，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在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上，口头上承认应当是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先维修、后生产，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实际干时却往往相反。在计划安排和物资分配上都有这种情况，几乎成了老规矩，这怎么能不发生问题呢？有些事情，一年挨挤还不要紧，年年挨挤，长期欠账，就成了严重问题，既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影响财政积累的增长速度。

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都是政治上、经济上极左干扰的产

物。目前正在编制长远规划，我们要认真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吸收国外经验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确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落实到经济工作中去，把我们具体的经济路线搞明确，把建设方针搞对头，这样才能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

关于今后的经济建设方针如何提法，尚需过细的研究，用一两句话也难以概括起来。我感到有几个带方针性的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考虑。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把国民经济搞活搞好。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这是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矛盾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把经济改革推进一步，我们完全拥护。我体会，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这三句话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我们知道，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只有发挥优势，避开劣势，扬长避短，才能把经济搞快搞好一点。这种扬长避短的实施，主要是依靠我们计划的调节，同时，也要依靠必要的市场调节，也就是通过竞争，使优势与劣势进行较量。不搞点竞争，不从政策上、体制上保护这种合法的竞争，生产就不容易搞好，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也上不去，而市场调节也搞不起来。经济规律是无情的。开展竞争以后，必然有上去的，大大发展的，也有被淘汰的。这样就要给它一条出路，即走联合之路（联合投资、联合经营），联合起来好处多，力量大，大家都受益，积极性高，经济发展会快不会慢。当然，讲优势和竞争，也

有一个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全国有全国的优势，地方和部门有地方、部门的优势，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提倡全局照顾局部，局部服从全局，实现全国一盘棋。总之，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办比较好，需要在实践中试验、补充、完善、提高，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東西。

(二) 订计划，办事情，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好，人心舒畅。如果要求过急，计划绷得过紧，往往欲速不达，造成很大损失，并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叶剑英同志曾经说过，不怕慢，就怕走弯路，大上大下。过去我们的毛病往往出在大上大下上面，不量力而行、超过客观可能的大上，必然带来大下，因为不大下即难以为继。而大上大下的结果，必然给生产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想要快，实际慢。还有一条经验教训必须记取，就是情况一好，往往就折腾，不留余地，不讲综合平衡，最后走向事情的反面，受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搞经济工作的，既要有战略远见，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才行。陈云同志说得好：“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最近三位日本经济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和提供了建议，很值得我们考虑。他们讲：六十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五点二，七十年代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七（工业发达国家下降百分之三点一，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八，十年内上涨一点二倍），形成“滞、涨”局面。八十年代经济停滞动荡的局面将近一步加深，经济的发展速度将减慢到百分之三左右（经济发达国家百分之二至二点五，发展

中国家百分之四点三至四点五)。他们建议中国近期内不要过分强调数量和速度，而应力求打好基础，稳步前进。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但还不具备飞跃发展的条件。因为农业生产还不足以保证十亿人口生活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发展工业，包括能源、运输等，需要大量的投资，目前还难以满足；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刺激提高生产的制度，改革还需要一个过程；对外贸易的能力也不强。因此，不应过高地追求速度。他们建议，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定为百分之五至五点五，即使这样也高于其他国家，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将由八〇年的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七。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日本专家的意见很好，应该好好考虑这个建议。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日本经济专家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所提建议比较客观，值得我们很好研究。

(三)正确处理消费与积累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各种比例关系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从一九七〇年以来，我们的积累比例偏高，一般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七八年达到百分之三十六，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搞长远规划积累比例按百分之二十五安排，大家都一致拥护。中央下这个决心是十分必要的，是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为什么把积累基金的比例定为百分之二十五是合适的呢？我看至少有三条：一是从三十年实践来看，积累比例过低不好，过高也不好，百分之二十五比较适当；二是搞长远规划，应当比年度计划留有更多的余地，搞得更加稳当一点，计划绷紧了，是要吃亏的；三是积累比例低一点，有利

于逼着大家去抓经济效果，少花钱多办事。同时消费方面搞得松动一点，可以多办一些改善人民生活的事情，这对于安定团结、调动积极性、搞好全局是很有利的，这说明，控制积累率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那么，积累比例搞百分之二十五，是否经济发展就没有速度了呢？不能这样看，钱多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好，钱少了也不一定把事情办得差，关键是要把资金使用方向搞对头，大力提高投资效果，包括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在内。只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就可以少花钱，多办事，把事情办好，实现多快好省。最近中央决定压缩基建总规模，改变大项目的审批程序，严肃基建纪律，就是为了加快建设速度，提高投资效果，减少损失浪费。这是对人民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

（四）坚持农轻重的方针，在经济结构方面走轻型化的路子。从中国的情况和世界一些国家的情况看来，毛主席提出的农轻重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优先发展农业，先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发展重工业，这样经济发展只会快不会慢。当前发展农业，主要是靠政策靠科学，国家不必拿很多钱，但将来还是要花很多钱的。轻工业必须大大发展。它投资少，收效快，对财政、市场、出口都很有利。轻工业积累资金多了，就有钱来发展重工业，日本叫做“以轻养重”。对重工业也不能一概而论，如煤、电、油、运就要优先发展，但钢铁和机械工业，目前可以少投资，暂时放慢一点，不再铺新摊子，主要搞品种、质量、提高技术，不要追求数量。轻型结构的提法是否确切，还可以研究，但在改变经济结构方面，大有文章可做，从结构中

求速度，是一条新的路子。

（五）在承认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可以考虑走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的路子。据了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种类型：一是集中型，先从一个或几个地区突破，带动全国；一是分散型，全国平衡发展。日本、美国的发展都是集中型。从我们的经济来看，齐头并进，全面开花，平均使用力量，没有重点，经济效果并不好。似乎可以考虑，先在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多投一点资，使他们发展得快一点，然后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一个省来说，先集中搞几个重点，然后带动全省，这样短期内可以得到明显的效果。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要忽视其他地区，而是说一定时期内，在全面安排之中，要突出重点，有先有后，波浪式地前进。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发展快了，对全国可以多做贡献，对经济落后的地区才有力量支援。这个问题应当好好研究一下。

（六）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除了解决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方针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加强领导、提高工作水平的问题。我感到从一九五八年到“四人帮”垮台这一段（三年经济调整时期除外），由于极左的干扰，我们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也是有不少问题的。比如：处理政治问题比较严肃认真，处理经济问题则比较马虎，过去经济上出了问题，不追究责任，几千万、甚至几亿元的损失，打个哈哈即过去了。这种作法往往助长经济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办事不认真，缺乏严肃负责的精神，对工作危害很大。又如，不注意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说大话，说空话，甚至瞎指挥，这怎么能把财经工作领导好呢？又

如，在经济上重生产，轻管理，注意抓投资，不抓经济效果，以致我们的经济管理水平和经济效果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又比如，不讲法治，强调人治，往往一个人一个说法，前后左右矛盾，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一个制度，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一些地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对国家规定的制度“各取所需”，“择优选用”，各行其是，谁也管不了谁。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经济工作又十分复杂，没有健全的制度是办不好事情的。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大改变，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同形势发展很不适应。为了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改进我们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 二、经济效果问题

经济效果，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原则。即：我们无论订计划，搞设计，安排生产，组织商品流通，进行基本建设，都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从中选出花钱少、收效大的最优方案，以使用最小限度的消耗，取得最大限度的使用价值。这个问题同我们财政工作联系密切，影响很大。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积累建设资金的速度，而且还关系到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的方向。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经济效果问题，并把这个经济原则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和资金积累、分配情况来看，我们工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发展速度为百分之八，比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低；国家为建设事业花的钱共达一万五千六百余亿元（预算外资金约三千多亿元还不在于内），钱也并不很少，应

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为什么现在还这样穷呢？除了我国底子薄、基础差以外，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很低，在基本建设和生产方面都打了消耗战，创造的社会财富少，再加上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搞得不适当，所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人民是不满意的。

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有各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看，过去搞的战时供给制，在战争年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这种“供给制”、吃大锅饭的思想，带进到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来。我们的某些制度办法也有这种供给制的特点。这是不适当当前情况的，也是有害的。当然，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多年来极左思潮的影响。好象讲核算，讲效果，讲经济利益就是资本主义，而不计工本，不计得失，不讲利润，只要搞上去就是胜利，似乎是“社会主义”，似乎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们过去办了不少图虚名、受实祸的傻事。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中，烧毁了大量木材和山林，砸毁了大量铁锅和铁器。这方面的帐是算不清的。能够算帐的，光是财政上拨付的小钢铁亏损，三年就有一百一十亿元，而炼出的钢铁都不能用。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方面有了恶性发展，到处批“唯生产力论”，批“利润挂帅”，形成“赚钱可耻、赔钱光荣”。一九六七到一九七六这十年间，国营企业亏损共达九百四十八亿元，扣除粮食亏损和其他政策性的亏损，属于经营管理方面的亏损约为四百二十亿到五百亿元。这实际上是吃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当然上不去，更谈不上人民生活的改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抓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这两年情况有了改变，大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但是总的说来，许多同志还重视不够，特别是还没有从国家计划管理到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经济责任制，生产建设中的各种浪费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我们认为，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方针的高度，下决心从计划安排、经济结构、工业调整、经济管理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认真解决。否则，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上不去的。

从财政状况来分析，至少在最近几年内，要想靠增加很多投资来把生产速度加快搞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一九七九年出台的重大经济措施比较多，而且要继续搞下去，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税收、调整工资、恢复职工奖金、待业人员就业等，几件事一起办，三年之内国家要拿出六百亿元。这样就把财政收入增加的部分吃掉了，不可能再拿出很多钱来增加基本建设和其它方面的开支。第二，为了解决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问题，调整比例关系和改革经济体制，头几年总是要花代价的。这种代价必然要反映到财政上来。一九七九年国家财政已经发生很大的赤字，今明两年还会继续发生赤字。为了尽快地消除赤字，除了努力增加收入外，还得适当控制与压缩支出。第三，目前能源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估计近几年内石油可能上不去，电力缺口很大，煤也不富裕。即使我们能够建设一些新厂，由于能源和原材料不足，也难以正常开工生产，创造财富，增加收入。这三条原因，大家可能都是清楚的。那么，要想多搞一些基本建设和其他事业，还有没有其他出路呢？比如